

华中师范大学二〇周年校庆丛书

丛书主编 / 马敏 黄晓玫



华中师范大学由早期的教会大学、中国民办大学、共产党人创办的革命大学组合而成，一百余年来与时代、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而其中的逸事、掌故、风物正是这个学校历史命运的侧影。

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

—— 掌故 · 逸事 · 风物

BAINIAN HUADA YU BAINIAN JIYI

ZHANGGU · YISHI · FENGWU

◎ 周挥辉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二〇周年校庆丛书
丛书主编/马敏 黄晓玫



本书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课题“百年华大与百年
记忆”的最终成果

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

—— 掌故·逸事·风物

BAINIAN HUADA YU BAINIAN JIYI
ZHANGGU · YISHI · FENGWU

◎ 周挥辉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掌故·逸事·风物/周挥辉 编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华中师范大学 110 周年校庆丛书)

ISBN 978-7-5622-6195-7

I. ①百… II. ①周… III. ①华中师范大学—校史 IV. ①G659.28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5939 号

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掌故·逸事·风物

©周挥辉 编著

责任编辑:王 炜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 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20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25

版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言

章开沅

很早就注意到，华师校报连续刊载史话类型的校史文章，文笔老到，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作者署名沧海一粟，也颇得我心。这大概是作者的自谦，体现了不愿张扬的朴实，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暗喻，对于数千年人类文化长河来说，一所大学也无非是沧海一粟吧，连涓涓细流都不够格。

但是我不知道“沧海一粟”究竟是谁。直到两周以前，他把已在校报上连续发表的68篇文章，编辑成一本《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掌故·逸事·风物》书稿，并向我索序，我这才知道作者就是校报的“老报人”周挥辉。书稿附函说我对他的长期校报工作给予“很多关怀和支持”，但是却“很少谋面”。此话倒也属实，因为我一年到头总是穷忙，而且经常出差在外，校内同事反而很少找我，唯恐我年迈而又过于劳累，而我则乐得以“君子之交淡如水”自我辩护。

写序倒是及时应允，因为我早就期盼有这么一本轻松可读的校史史话，而作者又是对华师感情甚深、了解较多的写作高手。这本书的出版，一定可以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让校内外更多的人阅读理解这所百年老校。

天下却有这样的巧事，正当我开始动笔写序之际，却发现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署名李拯的短评：《高校何必苦苦攀“先祖”》。文章一开始便直陈时弊：“这些年来，给自己找一个出道早的‘东家’，似乎成为一些高校竞相追逐的时尚。只要有蛛丝马迹可以凭依，哪怕只是名字上相似，牵强附会的有，偷梁换柱的有，移花接木的也有，向前延伸校史风，在一些高校吹得不亦乐乎。”

他已经注意到目前某些高校“寻祖”的牵强附会，而且还特别警示校史叙事不容许有任何“攀附”、“拔高”、“溢美”。当然，作者并非全盘否定

发掘老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他反对的乃是借所谓“老字号”装点门面，以及因此而出现的任意拼接校史的乱象。所以，他紧接着又说：“深厚的历史底蕴，确实是高校最具魅力的地方。那些时代久远的教学楼，从历史中走来的图书馆，青砖堆砌的运动场，漫步其间让人产生一种历史传承的厚重感，这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负笈求学之所。然而，历史底蕴有没有，这是历史所决定的，又岂是回溯校史就能够创造出来的？”

我完全赞同作者的意见，但仍然坚持要为《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掌故·逸事·风物》的出版鼓与呼。因为华师的“百年老校”没有任何水分，正如作者所言：“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我本人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之一，华师是以华中大学为基础，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中华大学等院、系合并建成，最初的校园就是华中大学原来的旧址，师资、建筑、图书、设备都是以华中大学为基础，甚至连初期的本科生也是从华中大学带过来的。华中大学的前身是文华书院，创办于1871年10月，至今已有141年，就是从文华书院创立大学部算起，也有109年，而明年就是110周年。

当然，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行政命令与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所谓“院系调整”，以及90年代同样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盲目贪大求全的所谓“高校合并”，中国大学的谱系与版图早已混淆不清，很难勾画出明晰的脉络与条理。于是有些高校的历史叙事，便出现了种种怪状，乱攀毫不相干的先祖固然可笑，任意抛弃血脉相连的先祖更为可耻。因此，我多年以前在大学校史研究会上就提倡“多元说”，既要尊重历史真相，也要面对现实状况，在校史叙说与校庆举办两方面，都要厘清学校形成的多个源头，切忌简单、粗暴地定于一等。

本书作者周挥辉业已注意到中国大学校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他在“前言”中强调指出：“我校前身的三所大学各代表一种教育文化现象（西方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在中国教育史上都留下很多符号性的文化记忆，令人骄傲的事情很多。”读完书稿，我认为他确实花费很大精力来寻找华师百年这些“符号性的文化记忆”，一事一叙，娓娓道来，点面结合，条分缕析，引人入胜。作者谦虚地自称：“试图以一种通俗的方式，用随笔的手法从细节或故事的角度书写，这样可能会生动些，可能会便于阅读和

广泛传播。”应该说，他为自己写作设定的目标已经出色完成。

我们重视校史，乃是尊重前人的劳绩，而不是把百年漫长岁月当作某种可以夸耀的虚荣。实事求是地说，华师本来就并非出自什么名门望族。其三所学校前身都有各自的局限。华中大学虽然年资甚老，但在教会大学当中规模偏小，声望自然逊色于燕京、金陵等名校。中华大学虽然号称与北方的南开并峙，但办学档次亦较偏低。中原大学虽然拥有革命的激情岁月，可惜持续时间只有两年多。但是，这三所学校在不同时代却也都曾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华中大学至少在内地是开风气之先，最早引进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而且有些学科还办出了自己的特色，甚至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华大学尽管在办学条件与师资队伍方面有所欠缺，但是却能敞开校门，广泛延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营造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乃至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提供宽松环境。中原大学则为老一辈革命领导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手创，把崇高信念与延安精神引进普通大学，并且已经形成优良传统并融入校园文化。

纵览百年，华师真正的辉煌，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最近十多年。本书最后12篇已有浓淡相宜的平实描述，可惜只写到百年校庆便戛然而止，还有待于今后的续篇。这些都说明新一代的华师人，绝对没有在祖宗的余荫下蹉跎岁月，而是如同那些披荆斩棘的先驱者那样，抓紧一切机遇，奉献全部心血，把华师办得越来越好。校庆绝不仅限于缅怀过去，更重要的还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努力完成他们那些宏伟的未竟之事与未了之愿。尊重历史，超越历史。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而从这个意义来说，校庆应该就是又一次新长征的起点，又一次教育革新的真诚誓师。

谨以《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掌故·逸事·风物》的出版为契机，表达我对华师与华师人的恳挚期盼。请允许我如同10年前那个激情似火的校庆晚会那样，再次振臂高呼：“华师永生，华师万岁！”

2012年12月于桂子山

前 言

我是1981年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1982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正在上劳动课的我们年级100多人坐着学校的大卡车去位于武昌江边不远的昙华林华中村植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昙华林，知道昙华林里有个华中村，华中村是华师的一个老宿舍区，当时华师的很多老教授还住在那里。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宣传部做校报编辑工作，校报在学校的印刷厂排字和印刷（当时还是铅字排印时代），印刷厂当时就在昙华林华中大学的老校区里，毗邻华中村。校报当时为周报，这样我不得不每周至少一次坐15路公共汽车从桂子山校区去印刷厂“对红”签字付印，因为这样，我常常要在印刷厂呆上一整天。很多的中午时分，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下班回家了，我无所事事，就在胭脂路、昙华林街区、长江边逛悠，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七八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刷技术的又一次大革命，激光照排技术的广泛应用，我才结束了每周往返昙华林的折腾。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也要感谢那些年艰苦的岁月，特别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中午，它让我看到了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有些原汁原味的老街区、老房子、老建筑、老招牌，比如文华公书林、华大女生宿舍（颜母室）、中华大学礼堂等。这些老建筑、老街区当时虽然破败，年久失修，但它们的特点还是很容易植入人的脑海的。还有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巷子、小街道，以及它们很好听的名字也令我至今记忆深刻。比如凤凰山、螃蟹岬、戈甲营、鼓架坡、高家巷、郎家巷、操家塘等，尽管不解风情。遗憾的是，当时不懂自己置身于一个怎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竟没有好好寻访和拍些照片。

2003年，学校迎来百年华诞，我当时为校庆做一些宣传工作，直到此时，我才开始较为系统地“阅读”母校，才知道风雨一百年，一所大学的

成长和发展是多么不容易，她是有很多的人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他们的创业史、奋斗精神，学校在中积淀的文化是多么需要传承和弘扬。百年校庆两年之后，为了进一步感受学校的历史遗脉，我们单位专门组织了一次去昙华林看母校历史的活动，特别邀请了武汉城市史专家刘谦定先生讲解。刘先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带领我们寻访了昙华林街区所有与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等有关的历史文化建筑和遗迹。当时，武汉市政府领导和其他大城市的领导一样，开始兴起了大规模的历史文化遗址保护修缮工作。昙华林作为武汉发展史上特有的一个文化街区，也在进行规划和修整。我们骄傲于刘先生动情的讲解中，我们遗憾于刘先生动情的诉说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校前身的三所大学各代表一种教育文化现象（西方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在中国教育史上都留下了很多符号性的文化记忆，令人骄傲的事情很多。但遗憾的是，这三所大学在昙华林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中已没有一件是华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把“根”留住。当然，这些遗憾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全盘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不顾及大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全部打散重组，几乎把华中大学历史上的“宝贝”全部给了其他学校；加之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法顾及一所大学的文化遗产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所以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进行紧张的拆迁、扩张和开发，一旦利益和文化产生冲突，人们往往最终选择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把保护文化遗产口号喊得山响，而保护效果不大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遗产仍然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因此，呼吁人们真心热爱文化遗产，科学管理文化遗产，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

校史是文化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育人很重要的文化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大学在热衷于校庆的同时，注意到了整理自己的历史，也注意到了在学生中宣传普及校史教育的积极意义，但大多只是流于形式，大多只是校庆阶段性的热闹，而没有从学校制度层面、文化深层层面、先贤治校治学精神层面在学生和校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传承，没有将其变成

滋润学生成长的沃土，没有变成大学的文化自觉。因此，我很希望我们学校能借 110 周年校庆之机，想一想更好、更切合实际的办法，真正能够把校史教育融入教育活动中，让学校史、知校史成为一种风尚，让百年优秀文化精神一代一代流淌在历届学子的血液里。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

百年校庆前后，学校已出版和翻译了一批优秀的校史著作，有关部门也编辑了一些很好的校史资料和校友回忆录。这些都给了我很好的借鉴，我这本书就是在那些书和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换句话说，那些书和资料是这本书的母亲。但那些书和资料或是从宏观的角度，以编年史的方式写作学校的发展历史，或是学校教育名人的个案研究，有很好的学术价值，作学术研究支撑很好。而我则试图以一种通俗的方式，用随笔的手法从细节或故事的角度书写，这样可能会生动些，可能便于阅读和广泛传播。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第三个原因。

我知道，这本书很粗糙，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粗糙的东西也是我在很多人的鼓励 and 帮助下才完成的。比如章开沅先生在读到我的几篇有关校史的小文章后多次在人后表扬、鼓励。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良明教授把他收藏的华中大学、中华大学校报复印资料借给我阅读，并就有关问题提了不少好的建议。刘谦定先生只要是打电话咨询他，他必愉快回答、讲解，即便是在他身患癌症化疗的过程中。华师出版社的范军先生、董中锋先生、学校办公室的付义朝先生、校友办公室的戴文波先生也多次指点和交换意见，特别是学校政策研究室把我的这项工作列入 2012 年度学校教育管理类专项基金课题给予支持。这些鼓励和帮助鞭策我努力完成了这本书，也算是一个交待。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第四个原因。

作者于 2012 年 11 月

小引一 百年校史的关键时间

华中大学（1871年—1952年）

1871年10月2日，美国圣公会驻鄂湘教区主教小文惠廉与中国牧师颜永京在武昌县华林创办的“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文氏学堂）正式开学，首次招收5名男生。至1873年，文氏学堂有了一定的规模，学生已达30人，至此，学校取中文名字“文华书院”。

1903年，文华书院成立大学部，学制三年，首批大学部招收文华书院毕业的9名学生。随之，文华书院分为正馆（大学部）和备馆（中学部），学制改为九年制，即预科（备馆）从初中到高中6年，大学（正馆）3年。大学部设有神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

1909年5月18日，文华书院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注册成功，学校正式定名为文华大学校。又被称为文华大学。

1911年，文华大学校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达成协议，文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是年1月16日，文华大学首次授予9名毕业生文学学士学位。

1924年10月2日，新成立的武昌私立华中大学在文华大学校园内举行开学典礼，89名学生注册。华中大学成立之初，文华大学校仍然存在。由于华中大学当时未注册，其学位授予仍以文华大学校的名义。

1927年5月，受全国不断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这年3月南京事件影响，华中大学被迫关闭。

1929年1月，长沙雅礼大学、岳阳湖滨书院大学部正式加入华中大学。9月，华中大学复办，韦卓民博士出任校长，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

1931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批准私立华中大学注册，中文校名为“华中大学”，英文名称为“Huachung College”，校长兼文学院院长韦卓民、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薛世和、理学院院长桂质廷。

1932年6月18日，华中大学举行了注册后的首届毕业生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4名学生获得了由教育部盖印的学士学位证书。

1938年7月10日，华中大学开始西迁，桂质廷负责西迁工作，历时月余，行程几千里，于9月下旬在桂林开学。

1939年2月20日，由于日寇对桂林的狂轰滥炸，华中大学开始再迁云南大理喜洲镇，至5月1日在喜洲镇开学，并开始了在喜洲长达7年之久的办学生涯。

1946年4月17日，华中大学师生开始自云南大理喜洲镇返回武昌复校，9月初，复校后开学。

1951年6月7日，华中大学最后一名西方教员离校，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决定，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私立华中大学合并，改为公立华中大学，并成立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

1952年10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指示撤销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组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校名暂定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

中华大学（1910年—1952年）

1910年，湖北黄陂举人陈宣恺在武昌府后街创办中华学堂。这是中华大学的肇始。

1912年5月13日，中华学校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宣恺任校长，其子陈时负责学校事务，校址设在武昌府后街和县华林。8月，中华学校正式招生，求学者近700人。

1915年3月，民国政府正式批准中华学校校名为“中华大学”，陈宣恺为学校法定代表人，陈时为代理人。9月，中华大学开办大学本科（此前学校只有大学预科）中国哲学门，这是我国私立大学依学制开办本科之始。

1917年11月，陈宣恺病故。12月，教育部批准陈时为中华大学法定代表人。

1919年5月6日，中华大学恽代英、林育南等发起武汉学生五四运动。17日，武汉地区26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

1926年9月，北伐军会师武汉，武汉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将国立武昌大学、商科大学及省立文科大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中华大学大学部合并改组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华大学停办。但这种仓促上阵，临时捏合的大学，不到半年时间即瓦解。

1928年3月13日，中华大学复办开学。

1929年7月，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中华大学院系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六个系。增设会计、师范专修科，保留附中、附小，实行学分制。

1938年10月，中华大学西迁宜昌小溪塔复课，武汉失守后，学校随之再迁重庆，12月底于重庆复课。

1945年6月，陈时辞去校长职务，改任常务董事，校董事会聘刘文岛任校长。9月，刘文岛辞，校董会举王震寰为校长。

1946年夏，中华大学大学部、初中部陆续返回武昌并复课。

1950年8月，中华大学改为公立，隶属湖北省政府教育厅。

1952年9月，中华大学化学系、国文系、教育系等合并到改制后的华中大学，其他系科分别并入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华南工学院等校，11月1日，中华大学校名撤销。

中原大学教育学院（1949年—1951年）

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解放区政府拟成立新型革命大学——中原大学。8月2日，中原大学正式成立。10月，中共中央决定范文澜任中原大学校长、潘梓年任副校长。

1949年8月，随着武汉解放，中原大学校部迁至武昌。12月5日，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正式成立，设政治、历史、俄文、教育四系，王自申任院长，院址始借华中大学学生宿舍和圣若瑟医院一栋楼房，1950年6月迁千家街原武昌高中。

1950年8月，教育学院开办工农速成中学，首批招收学员160人，这是现今华中师大一附中的前身。

1951年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私立华中大学合并，改为公立华中大学，撤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名称，成立改制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潘梓年任主任委员，韦卓民、王自申任副主任委员。

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2年—1953年）

1952年10月，公立华中大学校名和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撤销，改名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潘梓年任主任委员，徐懋庸、王自申任副主任委员。华中高师为全国院系大调整的过渡期，其存在时间不到一年。

华中师范学院（1953年—1985年）

1953年10月24日，根据国家高等教育部、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统一规定各高等师范学校校名的通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

1954年4月，中央决定原广西大学校长、历史学家杨东莼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

1966年4月，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学校中文、历史、政治、教育四系迁往湖北大冶办分院。

1970年11月，湖北省革委会决定全省29所高校保留13所，撤销湖北省函授学院、湖北省教师进修学校和中南民族学院，由华中师范学院接收。12月，学院在大冶办分院和附属农场。

1971年2月，学院在全省范围内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973年4月，华中师范学院大冶分院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移交黄石市，实行省市双重领导，它是今天湖北师范学院的前身。

1978年3月20日，学校举行粉碎“四人帮”、改革招生制度后的1977级学生开学典礼。

1984年9月12日，陈时纪念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隆重举行，陈时30余年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1984年11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协、湖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华中大学校友代表隆重召开韦卓民纪念大会，大会明确宣布：韦卓民是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

华中师范大学（1985年—）

1985年8月5日，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华中师范学院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1987年4月30日，学校举行首届“桂子山之春”艺术节。

1988年10月23日，华中师范大学校友总会成立，章开沅任总会长。

1993年10月2日，学校隆重举行庆祝建校90周年大会，江泽民、李岚清、雷洁琼等题词祝贺。

1996年8月29日，华中师范大学仙桃学院挂牌，这是校、市（县）30余年合作的开花结果。

1999年12月28日晚，一万余名师生在学校电影场举行“万人唱《黄河大合唱》活动”，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2003年10月8日，学校举行百年华诞隆重庆典，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小引二 晚清及民国教育新政

1862年7月，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国语人才，开中国近代新学校之端。

1872年8月，清政府公派首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此为留学教育之肇始。

1895年10月，清光绪帝批准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设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奏请，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

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同时负有统辖各省学堂之责，这也可看作是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的过渡。7日后，清政府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大小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学堂。将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将郡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将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其他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一律改为中西兼习学堂。

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近代中国第一份现代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对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作了规定。

1903年4月，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堂，标志着中国第一所私人创办的师范学堂诞生。

1903年6月，清政府谕令张之洞主持学制的修订工作，《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颁布并实施，即“癸卯学制”。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正式建立。

1905年9月，袁世凯奏请废止科举，推广学堂。清光绪帝颁布上谕：自次年（1906年）始，全面废止科举考试。这有力地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发展，使中国教育进一步近代化。

1905年10月，清政府设立学部，专管全国教育。

1907年3月，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专门补充了女子教育内容，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是年，清政府学部还颁布奏定各学堂学费章程，规定“师范学堂所有各费一律免收”。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所有学堂改称学校，初等小学可男女同校，废止读经，中学为普通教育，不必分文科与实科。

1912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育。”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1915年4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陈请国民会议及宪法起草会，拟将义务教育列入《宪法》，是年6月，教育部咨行各省推行《义务教育施行程序》。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着手进行大学改制，倡导“学术自主，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后为民国大学普遍采纳推广。

1917年5月，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它是中国最早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的教育团体，也是中国函授教育的肇始。

1922年，北洋政府废止中学各年级文言文教科书，从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教学教科书通行语言。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采用“六三三”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小学得分初、高二级，前4年为初级，得单设，为义务教育。近代中国学制得以进一步完善。

1923年8月，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宣布“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平民教育运动就此在全